

 岭南博士文库

公羊学解经方法

——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

许雪涛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许雪涛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0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

ISBN 7 - 218 - 05341 - 6

I. 公… II. 许… III. ①儒家②公羊传—研究③董仲舒春秋学—研究 IV. ①B222②B234.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378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 页	1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5341 - 6/B · 185
定 价	3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中文摘要

本书首先从人们对公羊学讨论的背景入手，说明与经、《春秋》、《公羊传》相关的基本研究情况，进而对《公羊传》和董仲舒春秋学解经的方法作了分析。目的是想从方法这个角度，对早期公羊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因《春秋》太过简略，说《公羊传》是解释其原意可以，即谓《公羊传》做的是解码的工作，相应地《春秋》就是编码的结果。而说《公羊传》是在自说自话也行，那么《春秋》只是其传达思想所借助的工具，它真正做的是编码的工作。传统认为《公羊传》是解经之作，我们亦假定《公羊传》是对《春秋》意旨的还原，并据《公羊传》分析了《春秋》编码的几种策略。之后，展示《春秋》复古之理想，并沿着《春秋》编码及所体现的作者处境，同施特劳斯揭示的“隐微书写”做了一种比较。

从现存资料看，董仲舒是汉初最早对《春秋公羊传》作系统解释的人，在关于董仲舒春秋学方法部分，先简要回顾了《春秋繁露》同董仲舒的关系，并对学者们关于《春秋繁露》中春秋学篇章的划分作了一种检讨。继而，从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文本的方法以及其春秋学同“天”结合的方法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公羊学若干概念在董仲舒那里的内涵加以总结。

早期公羊学的展开显示，后来者在解释时难免加入一



些新的东西，但经典本身的思想框架仍起着根本作用。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经典的理想内涵往往被用作塑造现实生活的资源。

【关键词】 儒家经学 《春秋》 公羊学 董仲舒 解经方法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starting with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discussions about Gong-Yang Theory illustrates the fundamental situation of investigation relating with Scripture, *Chun-Qiu* and *Gong-Yang Exegesis*, then analyses *Gong-Yang's* interpretation of *Chun-Qiu* and Dong Zhongshu's Exegesis method on *Chun-Qiu* doctrine, which aims at its primeval study in the dimension of method.

By reason of *Chun-Qiu's* over-simplicity, either can we regard *Gong-Yang Exegesis*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original meaning, or can we reckon *Gong-Yang Exegesis* as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composition. In the former case, *Gong-Yang Exegesis* will be a decoding to *Chun-Qiu*, accordingly *Chun-Qiu* would be a result of coding. If case were the latter, *Chun-Qiu* would only be an instrument, through which *Gong-Yang Exegesis* gets its code. In traditional view, *Gong-Yang Exegesis* is an enterprise of hermeneutics, the dissertation assumed it to be decoding *Chun-Qiu* and analyzed some strategies in it. Then sum up *Chun-Qiu's* "renaissance of ideal"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theory of "esoteric writing" revealed by Leo Strauss along with *Chun-Qiu's* coding and the author's corresponding plight.



From extant data, Dong Zhongshu is the first one who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Chun-Qiu Gong-Yang Exegesis* in Han dynasty. In this dissertation, briefly retrospect the relation between *Chun Qiu Fan Lu* and Dong, and undertake an explanation on its section division concerning Chun-Qiu theory. After two analyses on two aspects as (1) the method Dong reads the text of *Chun-Qiu Gong-Yang Exegesis* and (2) his relating Chun-Qiu theory to "Tien", dissertation summarize the connotation of some concepts of Gong-Yang theory about Dong's philosophy.

The study rests on the conclusion below: from early outspread of Gong-Yang Theory, though later-comers unavoidably add new elements in explanation,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of classics still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ir study. As it is, regardless of tradition or modern, the ide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s will usually be used as a resource to construct a real life.

Key words: the study of Confucian scripture *Chun-Qiu*, the study of *Gong-Yang Exegesis*, Dong Zhongshu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scripture



目 录

释题	1
第一章 经、《春秋》与《公羊传》	7
第一节 经之为经	7
第二节 是经非史之《春秋》	13
第三节 《公羊传》传经	23
第二章 《公羊传》解《春秋》之方法	30
第一节 解释之入路	31
第二节 《公羊传》训诂层面	39
第三节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码	54
第四节 复古之理想与公羊学几个主题	90
第五节 《春秋》与“隐微书写”	102
第三章 董仲舒春秋学方法	111
第一节 入路之说明与《春秋繁露》之真伪	113
第二节 《春秋繁露》中春秋学之篇章	118
第三节 董仲舒春秋学方法	126
第四节 董仲舒对公羊学几个主题之发挥	175



余论：关于解释的几个问题·····190

参考文献·····200

附录 文献综述·····212

后记·····231



释 题

我们的论题为《公羊学解经方法》，此所谓“公羊学”并非一个泛化的概念。盖因时代不同、公羊学者不同，公羊学亦不同，加之讨论范围的限制，是以有副题为《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讨论方法，难免涉及内容本身，即不同文本中之思想结构，我们即是取方法角度讨论之同时，探讨公羊学在初期的状态。

这里说的方法，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通过的途径和所采取的策略，是特指公羊家对公羊学文本做解释的方法。方法与目的相关，在正文中，通过对《公羊传》的分析，得出《公羊传》是针对《春秋》的表述，在问答的形式下对《春秋》大义加以还原。而董仲舒春秋学之目的不仅是还原，还在于在《公羊传》的基础之上，对《春秋》的主题加以深化，所以，董仲舒的春秋学突出了内在领受的一面。其实，即使是《公羊传》对《春秋》的还原，也要靠作者对《春秋》义旨的先行领受。此处所谓“领”是经典的引领，而“受”则需要解释者个人生存体验的担保，二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方法亦可以说是解释者将自身由领到受的过程和内容解释给他人的手段。在公羊学这个论域中，公羊学的源头《春秋》是孔子基于社会现实原创性的觉解，后来的公羊家虽然有经典引领的制约，但生存背景决定了其对经典内涵的取舍及发挥。此时，领



与受虽然一体，但后者是活的并作为主导者。所以，正是在“受”的意义上，我们说公羊学者的个人理解是核心因素。

无论是讨论《公羊传》还是讨论董仲舒春秋学，都离不开《春秋》这个背景。作为儒学基本经典之一的《春秋》，是春秋时期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体著作，相传为孔子所作。从文本看，其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之历史，包括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有《公羊传》、《左传》与《穀梁传》三传流传至今。《左传》详于记事，但其中内容有许多史事并非《春秋》所载，且《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左传》续经，终于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传文叙事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其虽有功于史，一般认为《左传》并非专为解释《春秋》而作。《穀梁传》与《公羊传》一样，是传经之作，行文较《公羊传》平实，但在历史上没有《公羊传》影响深远。

三传之传承与成书皆有疑问，唯可确定的是三传最早为统治者所悦纳大致之时间。《公羊传》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便居专经之位，而立学官当在景帝之时。^①对于《穀梁传》，《史记·儒林列传》说“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②《汉书·儒林传》则有“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③而鲁申公曾在汉高祖过鲁时，

① 至于之前所立博士之内容，据钱穆考证，汉初博士并不限于儒家，诸子之学也在其内。参见《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2页以下。《史记·儒林列传》有董仲舒、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之说，徐彦《公羊传序疏》引戴宏说《公羊传》于景帝时，由胡毋生及其老师公羊寿著于竹帛。如说可信，则《春秋公羊传》立于学官最早也是在景帝时。

② 《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9页。

③ 《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7页。



人见高祖于鲁南宫。说明《穀梁传》于汉初已有。但武帝之后至宣帝前，朝廷只尊公羊，宣帝即位，遂立之于学官。至于《左传》，仅于西汉末年，借刘歆大力宣传之波，经历了短暂学官之位，终因传统势力的反对而中途夭折。然时至东汉，《左传》及古文经学复又兴盛，出现了像贾逵、马融、郑玄这样立足古文兼及今文之人物。

公羊学就是以《公羊传》为源本所做的一系列解释，汉代董仲舒、何休^①等人自不必说。公羊学自东汉以后便不显，至清朝康、乾之际又为常州庄存与发得端绪。此后常州又出现了一位公羊学大师刘逢禄，刘氏春秋学祖何休之说，非《穀》辟《左》，同汉代古文学传系对抗，乃至于后来古文大师章太炎订刘氏《左氏春秋考证》得失，^②发得《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左氏春秋考证》逐条反驳，为古文经争地位。随着晚清政治时局变化，内忧外患加剧，公羊学改制等资源遂又为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所发挥以应对现实中诸多新问题。

公羊学虽在历史上两度兴盛，但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后世所认为的完整的体系。拿其发端《公羊传》来说，完

① 何休在公羊学历史上很重要，被誉为体系化了公羊学之人，《后汉书·儒林列传》称：“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为人质朴呐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蕃歿，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今有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较完整论述何休思想的著作。

② 参见《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7—866页。



整的注疏有何休的注与徐彦^①的疏，而二人注疏汉代烙印明显，已非《公羊传》原貌。后人理解公羊，基本上是以何休为蓝本。汉初董仲舒解《春秋公羊传》，可谓思之甚深，其摭摭要义，虽大致不出《公羊传》范围，亦非《公羊传》原貌。

公羊家在对经典解释之时有自身个性的渗入，加之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使得对公羊学的解释成为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尽管《公羊传》本身义理繁复，可能蕴含丰富之面向，但只是可能，文本自有其界限。只针对《公羊传》文字所透露出的信息，而不做过度的解释，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本书主要讨论其初期之方法，即从《公羊传》对《春秋》的解码（关于解码一词的使用，第二章第一、三节有说明），到董仲舒春秋学对《春秋公羊传》解释的方法，旨在以方法为途对公羊学源头作一思考，为以后的工作打个基础。人们鲜有对公羊学最初这个环节作过方法上的讨论，这也是做此题目的原因之一。

全书基本结构如下：第一章介绍人们对《春秋》及《公羊传》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提供一个接下讨论之背景。此部分主要以对“经”的两种基本理解，即以历史上经学

^① 阮元《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序》云：“徐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亦无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传徐彦所作，其时代里居不可得而详矣’，光禄寺卿王鸣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为未见也。盖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者。”（《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2页。）而《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徐彦疏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是唐末文体，遂认为徐彦为唐人。然而，徐彦疏中有解释“司空掾”为“若今之三府掾是也”，皮锡瑞于《经学历史》中谓：“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针对王鸣盛以徐彦为徐遵明之说，皮氏考诸《北史》谓：“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遂认为以徐彦为徐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3页）。



家和受启蒙理性影响至深的学者之见解为线索讨论，并在这种比照中，给出一个继续探讨应有的视角：尽量悬置历史上的成见，直接面对文本语言做分析，着眼于解释过程和方法。在确定了《公羊传》系传经之作后，第二章首先说明我们将要进行的路。入路以对“编码”和“解码”的基本理解为核心，认为《春秋》作者孔子在作《春秋》之时，刻意做过一些设计（编码），将其褒贬义旨寓于一字一词之间，即所谓《春秋》所特有的书写方法。而《公羊传》解读《春秋》，就是沿着孔子编码线索将其中的“大义”还原出来。当然在后面也会看到，《公羊传》的解码有一部分并不针对“大义”，而是还原出了某些史实细节，这些当不在孔子编码范围之内。说明入路之后，面对的是《公羊传》中的训诂，通过对《公羊传》训诂层面的讨论，可以获得《公羊传》作者对春秋时期历史文化基本框架的认识。在《公羊传》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其自问自答的形式以及对同一问题连续不断地追问，这种追问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字词之训诂而终于义旨之显明。因此，在讨论训诂层面后，我们便以《公羊传》问式为线索，说明其解《春秋》之方法。此部分将有对六种基本方法的说明，在此过程中，除对方法澄清外，我们另有两方面的收获：一是通过所透露之义旨，可以知道《春秋》中含有复古的理想；二是通过对其深埋义旨的做法，发现“隐微”乃是因为孔子处境的尴尬。最后，沿着复古的理想，并以几个概念为基础总结了《公羊传》的基本状态。而据《春秋》的编码以及孔子处境，我们将之同施特劳斯的“隐微书写”加以某种比较。第三章介绍董仲舒春秋学方法。董仲舒春秋学就是《公羊传》之学，主要体现在《春秋繁露》中。在讨论其方法之前，对《春秋繁露》的真伪以及《春秋繁露》中关于春秋学的篇章做了考察，并对春秋学的篇章划分做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依据。就董仲舒春秋学而言，



文中的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文本解读之法，又分为表层和深层方法，所谓表层者是指董仲舒发明了一套理解《春秋公羊传》文义的方法，如“春秋之辞多所况”、“得一端而博达之”等，前贤如徐复观等已有过对此层方法的讨论。而对深层融通，即所谓“求心”，我们通过“志”、“指”两个概念展开。第二部分讨论董仲舒春秋学与“天”的系统的结合，包括《春秋》与作为信仰之“天”的勾连之法，从其两个特征“灾异与郊”和“德性”两个路子说明，之后将“元”作为这种勾连的中介。第三部分简要讨论董仲舒与其时代学术思想之关系。最后，对公羊学几个重要观念在董仲舒思想里作了总结，并显示了同《公羊传》的距离。余论中，则对本书自身的解释作了一个最基本的反思，主要表明了对文本理解的成立问题，亦进一步申明在经典研究中的立场。

《公羊传》之解码，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融通以及其春秋学与“天”的关系，是本书主体。以方法为主要面向，其背后有两条线索：一是对应着还原，表现在文中对《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基本状态和主旨的探讨，并归于对几个主题的说明。二是以“个体性”觉悟作为公羊家最终根据，其表现在，在《公羊传》里是孔子复古的理想，在董仲舒那里则是“元”的观照，都是基于发觉现实生活同其理想有距离，而发出的匡正俗世之声音。



第一章 经、《春秋》与《公羊传》

人们在对所面对的世界进行思想之时，往往将视野回溯到经典当中，期望通过考察古人的智慧，为自身对世界的觉解乃至安身立命寻索出一些资源，为自己寻求一种合理生活方式。经典这个范围太大，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及在汉初的解释方法。在讨论公羊学初期解经方法之前，鉴于人们对“经”这个概念的含义、《春秋》与《公羊传》作者及传承的看法并不统一，有必要先作一点说明，并提出往下讨论的基本立场。

第一节 经之为经

讨论《春秋》与《公羊传》离不开“经”这个语境。通常所谓的“经”，就其载体来说就是指“经典”，“经典”是我们在做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时经常要面对的。然则，何谓经？人们在问何谓经之时，有两个问题有待分开，即经在历史上指什么？经应该指什么？经在历史上的存在无疑是个事实，如先秦六经，汉代七经，唐代九经、十二经，宋代十三经等。一般来讲，传统的经之所以为经，不外两



个标准：一是其中有深刻的带有普遍性之义理，或是在某一方面做出了很基础很权威的工作（如《尔雅》作为通释语义的著作，只是理解其他经典的工具，在唐以后也尊之为经）。二是帝王之钦定，传统的经既是圣经，又是法典。而后一个问题，经应该指什么，与前一个问题亦相关联，儒家经典范围在历史上被不断扩大这一事实，迫使人们思考“经”这个名目下诸多经典变化中之不变者。人们对经的理解通常建立在经应该指什么之上。经应该指什么，如考察“经”这个字的字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经，织也。从系，圣声”。清段玉裁注为“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世谓之天地之常经”。^① 从中可见，“经”字的本义含有“先有经，而后有纬”、“天地之常经”之义，意味着“经典”有着规范和引领的内涵。与引领相对的是受用，对有不同生存背景的人而言，取向会有所不同。引领与受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经典源发于一种精微的创造，而终于解释者的认取。于是，经典范围在历史上不断扩大，便与解释者所处历史时期的解释传统，以及现实政治环境的需要有了—定关系。然而经典的内涵又极有可能在不断地对人们的熏染中，内化为人们理解的基础。好比一辆因惯性行进的车子，人居于其上便自然而然随着车子启动时的方向前行，除非受到相当力度的外力干扰，车子很难停止或改变方向。因此，经应该指什么，便很难有明确的保障，最保险的办法大约只能说经是道的载体，其中有需要人们反复体悟的对合理社会人生担保的一面。就儒家经典来说，尽管经典范围不断扩大，仍有一个统一的义理系统。

从人们对经的认取（受用）上看，极端点说，会有不

^①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同的表现。有一种表现在于认同经典中的义理，并以之为根基进行“新瓶装旧酒”式的注解。此是将经的内容视为万世不易之真理，这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下对权威和传统的认准，有人以“同下一盘棋”为喻，十分有趣。^① 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不外是在做这种工作。另外一种表现则因有外来思想资源的助力而有相反的倾向，试图通过对传统经典之成立的考察，来瓦解其神圣性，如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所做的工作。

此时如果考虑一下理解者的理解背景，近代启蒙理性的输入及接受与否，是形成不同认识的关键。且不说古代经学家，从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所示的读史方法中，可以看出其对经性质的理解，至少与启蒙思想家们以及受启蒙理性影响至深的学者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与古代经学家是扞格不入的，都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成见思考问题。

除此之外，还应提及一种如刘小枫提到的萨拜因式自由主义的理解。这种做法搁置历史中的价值论，只是描述性地分析历史中的政治思想，认为史学者不可能知道人类的历史朝着遥远的神圣结局前进。历史中的政治思想都带有个人或群体的评价和偏爱，当今的政治理念亦有其价值偏见。^② 这种悬置价值观的做法，恐怕只是一种理想情态，

^① 王汎森这个词用得很妙，在谈及纬书中的孔子时，由批评傅柯(Michel Foucault)《权力与知识》中所强调的权力对知识主权式的、单向渗透式的决定作用，而指出在知识造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二者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以权力使谶纬为统治服务，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不信谶纬(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13页)。另外，从传统中对经“天地之常经”之定义，也透露出此种信息。现代人尽管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仍不乏对中国传统的观念抱着极大热情者，也可以理解为“同下一盘棋”。

^② 刘小枫：《臆说纬书与左传儒教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